

# 真正自由地选择真正的生活

## ——弗洛姆的生存思想与自由观的关联分析

徐 艳 吴德勤

(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上海 200444)

**【内容摘要】**本文以弗洛姆深刻的生存思想与自由观为研究对象,将弗洛姆的生存思想与其自由观进行关联分析,努力打通“重生存”和“积极自由”、“重占有”与“消极自由”之间共同的内涵本质。接着进一步通过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重占有”与“重生存”之间逻辑关系的分析,引导出真正自由地选择真正生活的可行之道。

**【关键词】**弗洛姆 生存思想 自由观

中图分类号 B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0)04-0111-04

人类的生存与自由从一开始就是不可分的。一部人类历史也就是一部人类追求自由的历史。

弗洛姆对于人类生存现状的忧虑能够给予我们当今社会的发展一定的借鉴和警示,他从人的“占有”和“生存”角度来理解生存方式,对我们很有启发性。同时,他的自由观也在人类对自由的探索道路上留下了深刻的一笔,值得我们用心感悟。他的自由概念包含着两种不同的自由,即“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而且,这两种不同的自由指向与其生存思想中“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和“重生存的生存方式”间有着很微妙的关联和相通之处,能够引导我们探寻真正自由地选择真正生活的可行之道。

### 一、重生存与重占有生存方式

弗洛姆通过对人类心理分析,得出区分两种生存方式的结论:重占有和重生存。这是人对生活的两种根本不同方式的体验形式<sup>[1]</sup>。每个人在生存过程中必定需要占有某些东西,生存方式的区分就在于倾向哪一方面:重生存还是重占有,其实也就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与一个以物为中心的社会之间的区别。

当人重占有时,会把物据为己有并排斥他人,不付出努力也毫无创造性地利用他所拥有的物。也就是说,我与我所拥有的东西之间没有活的关系。我拥有物,物也占有了我,“因为我的自我感觉和心理健康状态取决于对物的占有,而且是尽可能的占有。”<sup>[2](P83)</sup>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据为己有和占有的关系,我要把所有的人和物,还包括自己都变为我的占有物。如此“占有”,自然就更谈不上自我的发展与实现了。

在重生存的生存方式中,恰好相反,是一种追求爱、奉

献、牺牲、创造性地发挥自己能力以及与世界融为一体的人与世界的关系。重生存倾向的人不占有也不希求去占有什么,人心中充满欢乐,创造性地去发挥自己的能力与世界融为一体,“重生存的生存方式的先决条件是:独立、自由和具有批判的理性。其主要特征是积极主动地生存,这种主动性说的不是那种外在的、身体的活动,不是忙忙碌碌,而是内心的活动,是创造性地运用人的力量。”<sup>[2](P94)</sup>

弗洛姆认为,在大多数人身上这两种倾向都存在:占有的倾向,说到底来自人想活下去的生物要求;生存的倾向,以奉献、分享和牺牲为乐,来自人生存的特定条件。至于哪一种占主导地位,则取决于社会的结构及其价值观的规范。“我们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让我们优先做出这一选择或那一选择。”<sup>[2](P113)</sup>

“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是从私有财产派生出来的”<sup>[2](P82)</sup>。这种重占有倾向又促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陷于紧张与恶化。从人和自然的关系来看,重占有使人将自然作为征服和掠夺对象,造成了全球生态危机和自然资源枯竭的危险。同时更恶化人际关系,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对抗和恐惧,甚至引起阶级斗争和民族之间的战争。

弗洛姆所推崇“重生存的生存方式”是对爱的追求和笃信,使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紧密联系。他要求人们以生存作为人生目标,本着爱的奉献和精神,努力从事创造性活动,享受生命的乐趣,体现出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同时他认为只有重生存的生存方式才可能造就健全的人格、健全的社会。

### 二、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弗洛姆认为,最初人们通过氏族、部落、信仰等的原始

\* 作者简介:徐艳(1982-),女,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吴德勤(1949-),男,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系联系在一起,人们意识不到自由,当人们摆脱了这种原始关系时便有了自由。一方面人们努力摆脱各种束缚,获得自由,另一方面,人们获得了自由却又感到孤独、恐惧以至于逃避自由。因此这种自由很显然是消极意义上的自由。

“消极自由”使现代人陷入一种苦境。因为独立的个人在解脱了以往那种一度使生命获得意义的束缚之后,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与社会的统一性,失去在固定社会结构中所曾拥有的安全感与归属感,这时人类感到前所未有的失落与孤独无助。为了求得生存与安全,人们便宁愿不要自由,而将那对自由的本能需求从“假自由”的幻像投射到某些安全的化身,比如专制、权威及对外物的依赖崇拜。因此,“消极自由”所带来的是自由与安全的分裂。这是消极自由片面发展的必然产物。

弗洛姆认为,只有消极自由,人并不能成为自由的人。人们可能由于自身的力量没有得到发展,使得自由成为其负担,因而逃避自由、放弃自由,重新投身于、依附于外在的力量,从而丧失自由。在此,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弗洛姆所言的人们要逃避的自由是消极自由,而不是积极自由。

所谓积极自由就是“成熟的、创造性的、发达的人其性格结构的一种态度、一个倾向和部分,在此种意义上,当我谈到一個可爱的、创造性的、独立的人时,我能够谈到一個‘自由’人。”<sup>[2](P83)</sup>这种自由不是摆脱外界束缚而获得的自由,而是内心的自主、自觉、自愿做事的自由。在这种状态下,人可以是自由而不孤立的,可以具有批评能力,而不会充满怀疑,可以独立而仍然是全人类的完整的一部分。而获得这种自由的方法,是自我决定、自主行动以及自我的实现。

就实现自我而言,积极自由充分地肯定个人的特点,因为人虽然是平等的,但是也有生而不同的地方。正是这种不同才促进自我的真正发展。只有充分尊重他人与自我的不同,才能促成个人有机地成长,这也是人类文化最有价值的成就。

积极自由还含有这样一条原则:在独特的个人自我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力,个人就是自己生活的中心与目标。人类特有个性化的成长与实现是唯一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真正的自由是“有所作为的自由”,个人能够充分地实现自我。

由此可见,弗洛姆认为,积极自由是人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使人能独立、自由、真实的思考,所思、所想、所感都应该是真正属于本真自我的,摆脱了传统的统治权威束缚,形成真正的自由。

### 三、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与消极自由

如上所述,弗洛姆认为现代人的自由有双重的意义。在现代资本主义中,一方面使人变得比较独立,依赖于自己,使人的个性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机会,而另一方面,又使个人变得孤独、寂寞和不安,感到自己失去意义、无能为力。这种心理状态妨碍人的个性自由发展,所以这种自由本身就意味着不自由。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现代人相信自己的行为是出于自我利益的动机,但在实际上,他却服务于一个不属于他自己的目标。人不懂得自己真正的利益是什么,就不会

真正地关心自己。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成功和物质利益已经成为人自身的目的,它使人投身于经济制度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不是谋求个人本身的幸福和自我的拯救。

在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下,人孤独、惶恐、忧虑、无能为力,由消极自由导致了逃避自由,导致了人本身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以及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异化,最终导向重占有的生存方式。

虽然人在征服自然上取得令人赞叹的成绩,但人并没有控制社会。相反,经济危机、失业、战争在支配着人的命运。人创造了商品,商品却成为人的上帝;人创造了世界,世界却成为人的主宰。他还是个“人”,但却是一个盲目的、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个人,感觉不到是生活的积极力量和中心。“因为我的自我感觉和心理健康状态取决于对物的占有,而且是尽可能的占有。”<sup>[2](P83)</sup>从而导致自我也成为了一个被占有的物,而这个“物”又是我们体验自我的基础。如此,人便渐渐地踏上了重占有的道路。他以为占有了更多的物品,人就有了想干什么的自由;他以为占有了更多的物品,在享受物品过程中,人就消除了孤立和恐惧。

马克思指出异化是自由的对立面,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主要表现为非人的关系、物的关系、互相利用的关系和商品交换的关系。反过来看,同样因为现代人采取了重占有的心态和价值观,使人与世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成为了据为己有和占有的关系,反而使人变得孤独、惶恐、忧虑、无意义,这种非创造性的生存方式反而导致了失去自我、本我、真我,最终仍导致逃避自由,并转向消极自由。

当然,消极自由与重占有的生存方式的存在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积极意义的。一方面,都是个人获得真正自由、独立和全面发展的必然的历史形式,也可以说是必经之路。正是通过消极自由和“重占有”的对立面的发展和否定,人的全面发展才能真正地发展起来,个人在片面性的发展中不断地积累着全面性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从而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准备条件。另一方面,消极自由和“重占有”的发展也在为消灭其自身创造必要的条件。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就在于,它在发展着自身肯定环节的同时也在发展着它的否定环节,消极自由和“重占有”在获得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在为自身的被消灭发展着一切准备条件。

### 四、重生存的生存方式与积极自由

获得积极自由的方法,是自我决定、自主行动以及自我的实现。那么争取积极的自由就必须采取积极的方式。弗洛姆主张,人的自发性活动就是人争取积极自由的方式,即必须采用重生存的生存方式。“人的自发性活动主要表现为爱和工作。人通过爱和工作达到自我实现,就可以获得积极的自由。”<sup>[4](P261)</sup>这种自发性活动是没有异化的主动活动,在那里我体验到自己是自己活动的主体。

可见,积极自由是一种追求爱、奉献、牺牲,创造性地发挥自己能力,以及与世界融为一体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其中爱就是这种自发性活动的集中表现。在重生存的生存方式中,爱使人消除了孤独,超越了自我的桎梏,使人联合起来。而爱的动力出于克服孤独感和分裂性的自发心理需求。人只有真正懂得爱自己,才能爱别人。在重生存的生存方式

中,我们是去改变未来,走在积极自由的道路上去爱,充分激发人的自我意识,从而力求通过自发性活动去实现自我。

也许有人会产生疑问,既然生存方式是自由多样的,不是一个模式,那强调重生存的生存方式是否会抹杀自由(积极自由)。其实这点并不矛盾。重生存的方式并不是具体的生存方式,自由本身就贯穿其中,自由既是手段,又是目标。况且重生存的价值并不抵制文化的多样性,多样性即为文化上的自由选择,可见重生存是自由的土壤。反而在重占有的方式中,人没有批判独立的理性,人是不自由的,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只有在重生存的生存方式中,人才能自由地发展人的潜能,每个人都有自己发挥的方式,如在舞台中,每个人自由地踩着同一节拍,但却可以做出不同的、丰富的、眼花缭乱的舞姿。

与此同时,当人们形成了真正的自由——积极自由,人自然能够在自发性活动的基础上,去爱、去工作,充分发挥其创造性的才智,达到重生存的生存方式。所以,重生存的生存方式与积极自由并存,和消极自由对立,而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与消极自由并存,和积极自由对立。

以创造性和爱为特征的自我实现即意味着成为一个自由——积极自由的人,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重生存的生存方式与积极自由同义,人的自我实现与积极自由同义。

## 五、真正地选择真正的生活

### 1.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逻辑关系

弗洛姆认为积极自由在逻辑上包含消极自由,但是消极自由在逻辑上不含有积极自由。因为积极自由本身应该包括不受外界的束缚,如果个人还处于束缚之中,还没有隔断与家族、部落或者社会的原始联系,那么也就无法达到独立的自我,也就不可能有积极的自由。“只有在极端尊重自我、他人以及我们大家的自我的个性的条件下,有机的成长才是可能的。”<sup>[4] (P341)</sup>

弗洛姆肯定,真正的自由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这两者的统一,并且积极自由是其内核。但事实上,人们往往只片面追求消极自由,造成这样的情形:人们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消极自由),却在新的自由面前茫然不知所措。

弗洛姆所主张的是积极自由,但他也主张把消极自由作为实现积极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没有割断人与自然、他人的原始关联,事实上,个人无法从自然、家族、种族以及社会中独立出来,那么个人的自我实现也就无从谈起。可见,消极自由有其历史必然性,是人类走向最终自由道路上的必经环节,同时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的历史现象。消极自由既会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加剧自己的影响,获得自身的发展,又会在这种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消灭自身发展的诸环节,实现对自己的扬弃。

弗洛姆在自由问题上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在肯定了消极自由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前提下,认为只有消极自由,人并不能成为真正自由的人。由于自身的力量没有得到发展,反而使得自由成为其负担,从而选择逃避自由、放弃自由,最终丧失自由。

因此,弗洛姆在强调消极自由的同时,很明确地表示:积极自由才是最终目的。消极自由只有从它是实现个性的

必要条件,或是从它作为积极自由的逻辑内涵的角度来论证其必要性。

### 2. “重占有”与“重生存”的逻辑关系

在弗洛姆看来,“重占有”与“重生存”这两种相矛盾的生存方式,是人对于世界及其自身所采取占有与奉献的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他认为,在大多数人身上同时存在着这两种倾向:占有的倾向,说到底来自想活下去的生物要求;生存的倾向,以奉献、分享和牺牲为乐,来自人生存的特定条件,以及与别人结为一体,克服自身孤立感的需要。至于哪一种占主导地位,哪一种受到压抑,则取决于社会的结构及其价值观和规范。

当然,一种方式的控制力量越强,另一种的作用就越小,最极端的表现是其中一种成为唯一的主导。因为两种方式对大多个体和社会都是真实可能的。弗洛姆认为在保证功能性占有的基础上,人要逐渐排除占有取向在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而确立重生存的价值取向。弗洛姆对保证功能性的占有十分重视,他认为必须给人以人道主义关怀,社会应该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可见重生存的生存方式并不排斥占有,但这种占有是一种功能性的占有,是生存的占有,是必需的,即为了能够生存下去,我们必须占有、保留、维护和使用某些物品。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占有——功能性占有是实现生存的前提。同时,也应该认识到,“重占有”的存在具有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其自身发展必然是与自身的扬弃交织在一起的整体,这个过程是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必不可少的环节。

当然,“重占有”与“重生存”是本质上不同的两种指向,正是通过“重占有”的对立面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才能真正发展起来,只有丢掉了“重占有”的拐杖,才能施展自己的力量,实现“重生存”的生存方式。

### 3. 真正地选择真正的生活

在生活中我们要理性地选择,揭开在背后推动我们无意识的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具有自由的能力,我们的选择能力才能随着我们的每一项选择而增强,最终真正地选择真正的生活——重生存的生存方式。

不可否认,我们降生在一个并非自己所选择的境况中,但重要的是,我们选择对待这些影响和境遇的方式。所以萨特认为许多人把抉择的责任推却给环境,这是不诚实的表现。既然如此,人可以完全自由地操纵自身走向生存吗?斯宾诺莎指出当感情占优势时,人就受束缚;当理性占优势时,他就是自由的。

对此弗洛姆与其一致。他认为“自由无外乎是听从理性、健康、幸福、意识的命令,反对非理性的情感的命令。”<sup>[5]</sup>那么在选择时,是什么支配着我们的意识?弗洛姆认为决定因素是认识。人通常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动机,而按照另外更加合理的动机行动,并且我们选择能力随着我们生活实践而永恒变化。我们的每一步都是迈向自身的完善、勇气和信念,做出理想选择的才能也随之增长,直至最终选择理想的行为。另一方面,每一次屈服行为都给更多的屈服打开了通道,最终丧失自由。所以,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存在的,只是选择的程度不同而已。(下转第127页)



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由此看来,面向未来的先进文化建设就是要始终植根于现实的实践,既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又总结经验,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亦即先进文化必须植根于火热的创新时代,在活生生的实践中化为先进思想,化为先进生产力,化为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化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

面向未来的文化建设要敢于超越和创新。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自我超越、不断创新的历史。超越和创新都是为了未来发展。文化建设

必须遵循这个历史规律,坚持在继承基础上实现超越,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创新。我国未来总体发展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富强是经济富强,这是基础;民主是政治民主,这是保证;文明是精神文明,这是标志。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既要为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提供精神动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又要着眼于精神文明的目标,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适应未来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长处,敢于超越,大胆革新,努力创造适应中国未来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上接第113页) 那如何才能真正自由地选择真正的生活呢?尽管弗洛姆为其解答进行了独特而深刻的探索,并曾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倘若我们循着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思维理路进行思考时,便会发现弗洛姆并没有为现代人指出一条“真正自由地选择真正生活”的可行之路,其自由观从根本上仅囿于精神领域谈自由,即所谓的精神自由,这就是他不如马克思的地方,马克思则强调的是真正的现实自由。也就是说,弗洛姆只是片面地发展了人的自由的一个方面,即心理方面,而不是全部。因此,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下理解弗洛姆的生存、自由思想才能显示出其真理性价值。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真实而非虚幻的自由必须体现为一种实在的物质力量,人之所以被称之为自由的存在物,深刻的原因在于,他是以实践的方式存在的存在物,实践与自由在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中是相互阐释的。自由既是人的实践所具有的特征,也是人的实践所导致的可能性结果。人的实践是人打破与摆脱外部世界与自身本能的限制束缚的前提与方式,人如果在什么也不做的情况下,那就什么也解脱不了,任何解脱都是伴随着人的实践而发生的,并表现为实践的结果。

马克思认为,自由只能在实践中实现,但物质实践活动由于受到自然存在物必然性的制约,它的自由是有限的,而人类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却是无限的。只有审美的艺术活动由于借助于象征性的中介则突破了物质实践活动的有限性,能够象征地实现人类能力全面发展的理想。

因此,马克思提出,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实现的是有

限自由,甚至仅仅是实现真正自由的必要条件。真正的自由在于由这种认识和改造必然性所带来的自由时间的增长,在于在自由时间里人类可以全面而自由地对待自身能力的发挥。

同时,马克思认为,现实自由并不排斥精神自由的内容,相反,它把精神的东西包容于自身,作为自身展开的不可或缺的观念前提因素。但无论如何,自由的精神只有外化为能动的现实活动,人的生存才具有真正自由的意义。

马克思并没有取消自由的积极与消极的两重涵义,他以自己的劳动实践概念对其进行了扬弃,吸取了其合理内核而创建了新的科学的自由观。对马克思而言,自由既包括超越外在障碍,也包括人能能动地自我创造、自我决定、自我发挥。通过劳动实践活动,人们才能够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从而实现与自然、社会的统一,同时也发展自己的能力与创造性,实现真正的自由,享有真正的生活。

参考文献:

- [1]吴光远,李慧.弗洛姆——有爱才有幸福[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56.
- [2]弗洛姆著.关山译.占有还是生存[M].上海:三联书店,1989:83.
- [3]弗洛姆著.都本伟,赵桂琴译.人之心[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13.
- [4]弗洛姆著.陈学明译.逃避自由[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261.
- [5]弗洛姆著.薛东译.恶的本性[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120.